

# 张文创办香港“达德学院”

张凤珠 口述 谢洪 整理



1947年除夕，达德学院的董事、教师、学生代表与来宾300多人的大合照（局部），第二排右七起为沈钧儒、郭沫若、张文、李相符、柳亚子、侯外庐、陈汝棠、陈其璠、章伯钧，以及中共香港分局统战部长连贯和狄超白教授等。

教授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又可作为民主党派开展民主运动的场所和据点”时，“会上张文最积极支持”。

## 与共产党人再度合办“学院”

1946年8月，蒋介石政权公开登报对时任广东民盟主委的张文等数十名广东籍的原抗日将领宣布“退役”。紧接着“事前已获得地下党的通知，知道了国民党要对民盟机关进行搜捕，因而在反动当局行动的前两天已撤离开了……”（陈柏麟《有关南方民盟活动的一段回忆》）接到上级指示的谢一锋火速通知张文马上撤离，并协助、陪护到粤港轮船码头，送他去香港。

张文等人到达香港后，首先成立由广东民盟成员组成的办学筹备小组，成员有李伯球、丘克辉和时任民盟南方总支部机关报《人民报》编辑部主任张琛等。

校址在哪？张文想起了九龙屯门郊外的一片园地，是民促代主席蔡廷锴于20世纪30年代购入的，虽然该园因不具备筹办学校的理想结构与布局，但仍为不失一尝试的方案，于是亲自找“高佬蔡”商量。蔡将军对张文这位“辛亥革命粤军将领、陆军学界元老”一向非常尊重信任，当即爽快地把园房屋屋契交给张文。这是继1936年，张文与共产党人宣侠夫、陈辛仁、梅龚彬等携手合办香港首间“中国新闻学院”之后，再度携手在香港合办的“学院”。

随后，张文即向香港“亚贸公司”总经理的表弟廖安祥借调其财务主管，并交锁匙给她，请其在筹备学院前期管理该园区和房屋等相关事务。

民盟南方总支部副主席丘哲校董提议，引用《中庸》书中“知、仁、勇三者，天下达德也”一句中的“达德”为学院名称，获得在港校董和筹备小组成员们认可和确定。

筹备的启动资金首先由学院董事会确定每位校董负责募捐1000港元以上，并开始为建校集资、募捐。后来，达德学院的经济来源有依靠学生缴纳学费，亦有依靠海外华侨和其他社会组织赞助和支持。

学院设法政、商经、文哲三大系和新闻专修班，由民盟成员邓初民、沈志远、黄药眠、陆诒4人分别担任系主任

和班主任，并由陈此生担任教务主任。

除此之外，其他教授或客座教授绝大多数来源于两年前曾已紧密合作、结成文化抗战统一战线的成员，有郭沫若、夏衍、杨东莼、邓初民、千家驹、陆诒、叶启芳、谢一锋等人。

在筹建达德学院期间，身兼民促组织部、民盟南方总支部副主任、民盟广东主委等数职的张文，依靠几十年从事民主、文化运动所形成的人脉优势，承担教授人选的沟通和联系等筹备工作。为了能够更快、更好地筹办这所民办大学，张文直接搬到丘克辉位于屯门青山的家中寄住，两位最熟悉情况的筹建主将不分昼夜、同心协力筹“达德”。

但是，年事已高的张文因身兼数职和操劳过度，导致哮喘病反复发作，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夫人来港后，只能寄住在朋友家中，以照顾他的生活，让他能够继续坚持参与达德学院的筹建和民促、民盟的工作。

不久，经过丘克辉向香港教育司帮办递交申请书、校舍平面图、主要教员名册和招生计划等资料的正式申请程序之后，港英教育司正式答复：同意试办，根据现有校舍，本期批准招生名额在200人以内。于是，达德学院筹备小组即于1946年9月正式公开刊登招考新生启事，其时香港教育司亦派督学前往考场监考。

学院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在香港和海外公开登报的招生；有一部分则在内地民盟支部、其他民主党派和共产党方面的介绍和推荐下前往香港报考；亦有相当一部分生源来自于民盟南方总支部在海外的支部和分部，以及所办侨校、侨报等的推荐和宣传。因此，达德学院中的海外侨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1949年初海外学生超半数之多，成为达德学院有别于香港其他大学的一大显著特点。

1946年10月，“达德学院”试行开学（因多位校董均不在香港，因此开学典礼延至次年补办）。

## 在港统一战线活动中心

中共中央南方局为打破港英当局对香港共产党活动的限制，周恩来先后直接调派龚澎、乔冠华夫妇到香港筹建“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

龚澎是张文在同盟会时期亲密战友

龚镇洲的小女儿，乔冠华和张文早在抗战时期合办《新华南》杂志时就已相熟。张文带着孩子去最先期到港的龚澎、乔冠华夫妇俩合办兼居室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探望，同时约请乔社长抽空到达德学院讲课。此后，作为张文的女儿，我就多了一项任务——当张文与龚澎、乔冠华等人之间的信使，前期的信件多由我送到，后期我教书等工作比较忙时，张文则交身边的有志青年代为送达。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曾多次到达德学院作《国际、国内形势》等内容的专题讲座。他那极为生动和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每每让课堂和走廊都挤满了听讲者，给达德学院的校董、教授、学生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直到几十年以后，曾任学院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成员的谢一锋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乔冠华讲到蒋介石仗恃美国支持和美式装备，在全国范围发动全面内战，给中国民众带来巨大灾难时，充满同情与伤感地形容“长江的水日夜流，人民的血流日夜”的情景。

达德学院所授的课程有：杨东莼的《中国百年史》、张铁生的《国际形势》、翦伯赞的《中国通史》、沈志远的《中国经济概论》、邓初民的《中国政治概论》、千家驹的《财政学》和章乃器的《工商管理》等。

达德学院的专题讲座还有：董事长李济深所作的《七上庐山》、何香凝校董所作的《孙中山先生最后时刻》、郭沫若所作的《中国文化思想史》、茅盾所作的《关于文学创作》、夏衍所作的《关于中国戏剧问题》、曹禺所作的《关于话剧的创作问题》、臧克家所作的《关于诗歌创作问题》等。

民盟中央代主席沈钧儒、农工党主席章伯钧、民盟中执委刘王立明、副秘书长周新民和宣传委员陆诒，以及南方总支部、广东支部、港九支部、新加坡支部、英属支部等民盟海内外各支部和分部的负责人，都先后前来达德学院与校董、教授、学生们或欢聚、或听讲。

这些学术界、文艺界著名人士时常到达德学院或讲座、或演出，使达德学院成为悉心传授文化知识、培养中华民族未来一代建设人才的民主学府，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民主党派人士和文化人士所组成反蒋、反独裁的统一战线活动中心。

（本文由张文之女、达德学院预备班学生张凤珠口述，张凤珠之子谢洪整理。）

##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1899年，年近花甲的马相伯辞官后回到上海，潜心于天文学的研究和译著。两年后的一天，33岁的蔡元培到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担任总教习。期间，蔡元培特别想学习拉丁文。不过，当时上海懂得拉丁文的人很少，他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师。在蔡元培心灰意冷之际，有同事向他推荐了马相伯。

对于马相伯的大名，蔡元培早有耳闻，并且仰慕已久，他担心自己毫无名气，如此冒昧地前去拜访，很有可能吃“闭门羹”。思忖良久，蔡元培还是下定决心登门一试。那天，当蔡元培说明来意后，马相伯不仅没有摆架子，反而热情招待，他当即为我教书等工作比较忙时，张文则交身边的有志青年代为送达。

##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之一的周瘦鹃，是苏曼殊的忠实读者，青年时代就视其为偶像，他曾说：“予心仪其人，历有年所，欲一见以为快。”

1923年和1928年，周瘦鹃为纪念苏曼殊逝世五周年、十周年，先后编辑整理了《燕子笺残稿》和《曼殊遗集》两本书稿，由上海大东书局印行。他在《曼殊遗集》的《弁言》中写道：“十载相思，天独靳我一面，此心耿耿，不能已焉。兹采其诗文集，汇为一编，颜之曰《曼殊遗集》。”表达了自己内心对苏曼殊的崇敬之情。

周瘦鹃的《曼殊遗集》是当时搜罗苏曼殊各类作品较为齐全的汇刊本，由西神题签，附铜版插图数幅，以及遗像、遗墨等，精装一册，装帧讲究，封面和书脊文字、图案均以烫金处理，显得典雅精致。全书共分7个部分：一诗、二译诗、三书札、四随笔、五序跋杂文、六小说、七附录，

##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徐玉诺，河南鲁山县人，五四时期著名诗人。他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河南现代文学的先驱。

1922年，徐玉诺的诗歌创作呈井喷之势，他先后创作发表了大量诗歌，用“有疼痛感的语言”，真实描绘了乡村生活的苦难，被誉为“替社会鸣不平，为平民叫冤苦”的“血泪文学”，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好评。闻一多称赞徐玉诺是“有个性的作家”，诗歌堪与冰心的《繁星》比肩。

徐玉诺在现代文坛的崛起，也引起了鲁迅先生的关注。鲁迅先生囑咐《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给徐玉诺写信，商谈小说出版事项，并表示“自愿作序”。不料，这样的好事却被徐玉诺婉言谢绝。

徐玉诺为人特立独行，风趣怪异，留下了不少逸闻趣事。

1923年3月，正在河南临颖甲种蚕校教书的徐玉诺，送朋友去北京。因不忍分别，竟一起上了火车。到北京后，才发现身上的钱不够返程，便在《晨报》上登了一则《求职启事》：“徐玉诺

##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季羨林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为人处世的故事更令人感动和敬佩。一次，一位大学生李里前去拜访季羨林，请求解答学问上的问题。在来见季羨林之前，李里拜访了老作家孙犁，孙犁在李里事先准备好的条幅上题了字。谈话临近结束，李里也请求季羨林题字，给自己留个纪念。季羨林爽快地答应了。这时，有人上门来说：“下午要开会！”正巧电话铃也响了，忙中出了错，季羨林竟然将题字写在孙犁题字的背面了。季羨林发现后，十分自责地说：“这样吧，我随后用毛笔写个条幅寄给你，怎么样？”李里连连点头离开。本来李里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可是他回到重庆后，就收到了季羨林从千里之外寄来的条幅，上面写着：“做好学问大有可为！”李里非常感动。

还有一次，季羨林受文联邀请，去参加一个会议。临走前，他想起还没有给自己养的君子兰浇水，于是便匆匆交代给了阿姨。可是，当他外出归来时，却发现君子兰已经枯萎死了。原来，阿姨浇完水后，看着天气晴好，便把君子兰搬到了太阳下。

## 马相伯的热心

姚秦川

想到，他不知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只是握着马相伯的手谢了又谢。回到学校之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蔡元培将自己“拜师学艺”的事情告诉身边的师生，大家听后，除了为蔡元培的好运感动开心外，更为马相伯的真诚和善良所感动，一时间，许多喜欢外文的南洋公学的学生也纷纷找到马相伯，要求跟着他一起学习。

令人感慨的是，马相伯对于找上门来要求学习的学生来者不拒，并且不收他们一分钱的学费。同时，他也像对待蔡元培那样，为每一名学生都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很快，马相伯教外国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3个月，去马相伯那里报名学习的学生竟然达到了100多人。

马相伯义务教大家学习的善举在当时一时传为佳话，大家都对这位年近60的老人给予了极高评价，称他是“学子心中最善良正直的先生”。

## 周瘦鹃编《曼殊遗集》

周惠斌

辑的名字分别由包天笑、姚鸿雁、王西神、于右任、陈小蝶和周瘦鹃本人题写。书前收录了柳亚子的《苏玄瑛传》《苏玄瑛新传》以及章太炎的《曼殊遗像》弁言》，书末附录了一些友人纪念苏曼殊的诗文，如姚鸿雁的《曼殊上人示寂十周年纪念感怀诗》、周瘦鹃的《曼殊忆语》、顾悼秋的《年华风柳》、沈尹默的《刘三来言子毅死矣》、刘半农的《悼曼殊》等。

刘半农的《悼曼殊》作于1928年2月，其中写道：

有人说他痴，我说有些像/有人说他绝顶聪明，我说也有些像/有人说他真率说他做作，我说都像/有人骂他，我说和他不替人骂/更有人说他是奇人，却遭了庸死，我说庸死未尝不好/只此一个和尚/百千个人看了，化作百千个样子/我说他可怜，只是我的眼光/却不知道他究竟可怪不可怜。

亦诗亦文，别具特色。

## 徐玉诺的真性情

王剑

君愿充各级学校文学教授，或各报校对及各种书记员，每日工作十至十四个钟头，月薪只需十二元。”这则启事在“百物出卖”栏目中连刊两日，一时传为笑谈。周作人看到了，将徐玉诺接到家中，并答应给予帮助。

有一次，徐玉诺从福建返回鲁山时途经上海，见上海车站难民如潮，就把随身所带的800元钱悉数分给了难民。分完才发现，自己已经无钱购买车票了。于是，他大踏步上了头等车，很神气地坐下。当查票员向他索要车票时，他突然站起来，手指自己的鼻梁厉声喝问：“你不认识我徐玉诺吗？”吓得查票员连声道歉。

1950年4月，河南省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徐玉诺作为代表出席会议。他嗓音洪亮，满口土话，身上衣着已完全是农民打扮。讨论时，他突然激动地站起来，把瓜皮毡帽擢在桌上，大声喝问：“如今咱们有的报纸，农民能看懂吗？”举座皆惊。

在徐玉诺100周年诞辰之际，著名作家李準为他撰写了一幅对联：热情似火；单纯如婴。

## 季羨林的处世之道

李云贵

可她不知道，君子兰最怕高温。看着季羨林难过的样子，阿姨不知所措地站在在一旁，满脸羞愧和尴尬。没想到季羨林却安慰了阿姨一番。进屋后，季羨林跟儿子说：“这件事，其实确实不怪她，责任在我。我明明知道阿姨不懂得怎样照顾君子兰，可还是把这件事交给了我，你说这是不是我的错？”季羨林接着告诉儿子：“你要记住，他人犯错，常有一过而已！”

有一次，学生陪季羨林到一家邮政营业厅办事，发现季羨林每次开门，总是向外拉，从不往里推。他不解地问：“季老师，向外推门不是更方便更省力吗？您为什么总是要拉呢？”季羨林笑着说：“对于我自己来说，向外推门当然更方便，但如果里面有人正要出来，特别是老人和小孩，推门不是很容易撞到别人吗？而向里面拉门，就避免了撞到里面出来的人，还为里面出来的人开了门，这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学生此时明白了，难怪自己的老师一生从没有印过自己的名片，却处处赢得人们的敬重，原来他有一颗懂得为他人着想的心，这就是他人生最好的金字的名片。

## 夫子循循善诱人——

# 启功先生的教书育人之风

崔鹤同

“夫子循循善诱人”是启功先生怀念老校长陈垣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以此称赞老校长如何“循循善诱”地教导后学的精神和事迹。其实，这用来赞誉启功忠诚教育事业，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也非常恰当。

启功从1933年受聘于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开始，直到2005年谢世，从教70余年。启功在青少年时代接受过大多名师的教诲和指点，自己在从事教育工作时尽其全力加以发扬光大。

启功教书育人，处处以学生为主，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地对待学生，创造良好的、和谐的课堂氛围。他最老的学生——辅仁附中和辅仁美术系的学生，年龄比他小不了几岁，他们始终与师友身份相交，学业上他们终身师事启功，生活中又相处如兄弟。他最小的学生、他带的最后一届研究生比他还要小70来岁，他对他们视如己出，学业上、生活上都倍加关怀体贴。不管是老学生还是年轻学生，他都一律平等对待。上课时、课堂上是师生关系，毕业后、课堂下一律是朋友，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完全把教育

事业置于宽广的爱的情怀之中。

循循善诱，是启功灵活生动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启功教学绝不随人脚后、人云亦云，他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教出自己的东西、自己的见解。他讲授永远是娓娓道来，一口京腔，和蔼可亲，课堂气氛永远是那么热烈、轻松而又愉快。为了更好地联系实际，开阔学生的眼界，他有时带学生走出课堂，去参观故宫，介绍它的历史及独特的建筑艺术。寒冬腊月，藏族新年之际，又带领学生去观赏雍和宫喇嘛们祭神的舞蹈，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少数民族的艺术。他讲《牡丹亭》，带学生去看昆曲《游园惊梦》；讲《红楼梦》，带学生参观故宫和那里收藏的历代书画。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启功为第一届9名研究生教授古代诗词，讲得兴起，学生也说没听过，便主动延长课时，但校方说教室实在排不下，启功说：“这有什么难的，咱们干脆到你们宿舍合讲。”就这样，“宿舍课堂”开课了，教书的青年教师、外系的慕名者也纷纷带着小板凳来“蹭课”，一屋子足足装了十五六个人，真可谓“亲密无间”“打成一片”了。启功旁征博引，谈笑自如，听得大家如痴如醉，其乐无穷。

因材施教。启功深知，每个人的资质、喜好、兴趣、专业积累都不一样，要想

让他们成才，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发挥他们的特长，所以，他特别重视对学生，尤其是硕士生、博士生的个别辅导。他除了在校对学生适时地进行指点、引导，解决疑难之外，他的家里也成了学生的“第二课堂”。他家中一到晚上就高朋满座，但只要学生事先预约好前来请益，启功一定放下其他造访者，优先接待，然后朝先来的社会名流一拱手：“对不起，老兄，我的学生来了，我要上课。”对专门约好的学生，他会耐心地答疑解惑，而且还告诉他们回去以后还可以看哪些书。有些学生没有预约，他也很欢迎，会因势利导，和他谈些学术问题，讲自己在搞什么研究，写什么文章，需要查什么资料，有时也会让学生帮忙到图书馆查查资料，告诉他这些资料的重要性。有时他也会拿出自己的诗集稿本，讲他如何修改，为什么这样改。这样，“旁敲侧击”“曲径通幽”，使学生懂得自己该怎么做学问，怎么作诗写文章，获益多多，比上课还“过瘾”。

启功重视个别辅导，还体现在竭尽全力帮助学生解决治学中出现的难题上。他的博士生谢思炜要做白居研究，但有些文献只保存在日本，查找起来十分困难。启功就积极主动地利用他在日本的人脉关系帮他查找，复印有关资料，